

入唐高句丽移民后裔王思礼、 李正己事迹新探

拜根兴 张大兴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公元 668 年高句丽政权灭亡后, 大量的高句丽人移居中原, 唐廷将其分散安置于两京、江南道、陇右道等地。文章在海内外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爬梳在唐高句丽移民后裔王思礼父辈入唐时间, 推证其生年, 考释王思礼在安史之乱前后的事迹, 运用杜甫的诗作进一步证实王思礼为唐建功立业所做突出贡献。与此同时, 从同为高句丽移民后裔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姓名的由来, 诠释其虽出自高句丽移民一般家庭, 但在安史之乱大背景下最终演变为割据一方的跋扈藩镇, 辩证学术界对李正己如何处理新罗奴婢的不同观点。与入唐的突厥、粟特、百济移民一样, 在唐朝开放包容的国策下, 高句丽移民及其后裔逐渐融入唐人共同体, 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唐人的一分子, 王思礼、李正己两人的成长、为官历程就是很好的证明。

关键词: 入唐高句丽移民后裔; 安史之乱; 王思礼; 李正己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5) 06-0147-09

7 世纪 60 年代, 唐朝联合朝鲜半岛的新罗最终灭亡了高句丽政权, 新罗因此完成了三国统一。^① 此后, 大量的高句丽移民入唐, 唐廷随即分散安置这些移民于两京、陇右、江南等地。到 8 世纪中期, 入唐高句丽移民逐渐融入唐人共同体, 成为唐人的一员。^② 在唐高句丽移民及其后裔中, 有的人为唐捍御边疆、开疆拓土, 得以跻身于蕃将行列; 有的人在安史之乱大背景之下, 竟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在学术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对高句丽移民后裔王思礼、李正己事迹再予探讨。

一、高句丽移民王思礼事迹再探

有关高句丽移民后裔王思礼, 海内外学者研究得并不多。^③ 其中姜清波的研究比较完整, 基本展现出作为高句丽移民后裔王思礼的主要事迹。然而, 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触及或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专项 (17VGB011)。

作者简介: 拜根兴,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隋唐史、中外关系史; 张大兴,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专业方向: 隋唐·中外关系史。

^① 参见拜根兴:《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② 参见拜根兴:《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 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

^③ 参见姜清波:《入唐三韩人研究》,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第 106-112 页; 郑炳俊:《唐朝的高句丽人军事集团》,《东北亚历史论丛》第 24 号, 2009 年; 郑炳俊:《安史之乱与王思礼》,《新罗文化》第 26 辑, 2005 年; 李基灿:《唐代高句丽百济系蕃将存在的现状》,《韩国古代史研究》第 75 辑, 2017 年; 韩东:《杜甫〈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发微——与朝鲜李敬与次韵诗的比较为中心》,《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

1. 王思礼家族入唐及其年龄比对

王思礼的生年几何?现存史书对此没有明确记载,金石碑志资料亦未谈及,上述论著论文中并未有客观完整的论述。

翻阅现存《旧唐书》《新唐书》有关记载,其中对王思礼的出生及家族记载突出四点,即高句丽、城傍、营州、朔方,不妨引用原文说明。

《旧唐书·王思礼传》载曰:

王思礼,营州城傍高丽人也。父虔威,为朔方军将,以习战闻。思礼少习戎旅,随节度使王忠嗣至河西,与哥舒翰对为押衙。及翰为陇右节度使,思礼与中郎周泌为翰押衙,以拔石堡城功,除右金吾卫将军,充关西兵马使,兼河源军使。十一载,加云麾将军。十二载,翰征九曲,思礼后期,欲引斩之,续使命释之。思礼徐言曰:“斩则斩,却唤何物?”诸将皆壮之。

《新唐书·王思礼传》载云:

王思礼,高丽人,入居营州。父为朔方军将。思礼习战斗,从王忠嗣至河西,与哥舒翰同籍麾下。翰为陇右节度使,思礼与中郎将周泌事翰,以功授右卫将军、关西兵马使。从讨九曲,后期当斩,临刑,翰释之,思礼徐曰:“死固分也,何复贷为?”诸将壮之。

首先,从上述记载看,王思礼的祖先为高句丽人。高句丽灭亡之后,其家族被安置在营州一带的城傍。有关城傍及其涉及问题,此前诸多学者已有过探讨,对此,姜清波在其著作中也有论述,笔者在相关论文中也有涉及,^①在此不赘。最近宋卿依据现存《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陈子昂集》卷十《为建安王与辽东书》《为建安王与安东诸军书》、《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第五》、《资治通鉴》卷二〇五“万岁通天元年”条等史料,以及此前海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对有关“城傍”“城傍子弟”,以及营州所在原居住百姓和羁縻人口等作新的研究,认为史料中的“城傍子弟”指的是“诸蕃首领”,而“诸蕃”并非营州监管区居于原居地的少数民族,而是居于营州城傍羁縻州的少数民族。同时,这里的“城傍”即“城侧”,作者引用孙万荣、李尽忠的例子,以及《唐律疏议》卷八、《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七等史料证实自己的看法。作者还引用其他史料,得出“城傍性质的羁縻州”概念,论证唐武德年间在营州设立燕州、辽州、慎州、鲜州、崇州五个城傍羁縻州;贞观二年(628)至武周万岁通天(696)又设立了十三个城傍羁縻州,即昌州、师州、顺州、突厥威州(瑞州)、带州、玄州、归城州、夷宾州、归义州、黎州、沃州、信州、顺化州;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复置营州于柳城,并在营州设立平卢军使,开元七年(719)平卢军使升为平卢节度使,史料所见唐玄宗时代营州的羁縻州有师州、燕州、辽州、顺化州以及新设立的宁夷州。^②应该说,宋卿将此前学术界对“城傍”的研究与唐代营州一带设立的羁縻州联系起来,认为这些羁縻州为“城傍性质的羁縻州”,这个结论无疑是具有说服力的,从而将此前关于“城傍”的研究推进了一步。其次,宋卿将唐朝各个时期在营州设立的羁縻州逐一考证,进而使得史料中所见“城傍”有本可依。最后,宋卿明确了“城傍”就是“城侧”的概念,从根本上解决了一直以来关于城傍研究的主要问题。笔者赞同宋氏的说法。

至于王思礼的父亲王虔威,现有史料只有其加入朔方军,由于习于战阵、作战勇猛,在朔方军颇有声名的记载,其他情况难以详考。为理清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必须明确朔方军何时建立,为什么要设立此军事建置。对此,李鸿宾依据《资治通鉴》、《契苾明碑》、《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薛怀义传》,以及王永兴先生“朔方道行军大总管是朔方道大总管设置的初步”的论断,认为朔方军建立

^① 姜清波:《入唐三韩人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6-107页;栢根興「从新见入唐高丽移民墓志看唐代东亚人员流动」『古代東ユーラシア研究センター年報』Vol.3,2017。

^② 宋卿:《唐代营州与东北边疆经略》,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1-52页。

之始，当与武周延载元年（694）朔方道行军大总管的出现有关。^①也就是说，朔方军建立的时间为694年，王思礼的父亲王虔威加入朔方军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这一年。至于王虔威何时入唐，姜清波没有作确切的界定，即笼统认为可能是唐太宗或唐高宗时代。这当然没有错，但两者的时间差异多达三四十年。由于没有史料印证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依据王虔威入唐时间加以比对推证：

（1）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王虔威或者王虔威的父辈入唐。其一，如果此时为王虔威的父辈入唐，先是被编列于营州城傍，在营州一带生活，作为孩童的王氏一同到达唐朝，此时王虔威为10岁上下（姑且界定为10岁），那么，其出生年代为636年，到694年王虔威已是58岁，而王思礼的年龄至少也是30岁上下，到唐肃宗上元二年（761）王思礼已是百岁上下的年龄了。从各方记载看，这种可能性不大。即使王虔威入唐尚在襁褓之中，从年龄上比对，似乎也不可能。其二，王虔威自己20余岁或者30岁左右入唐，如上所述，核查王虔威之子王思礼年龄比对，其可能性也存在问题。就是说，从王虔威的年龄等要素推证，其在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入唐的可能性很小，这种假设似可排除。

（2）唐高宗总章元年（668），王虔威或王虔威的父辈入唐。其一，如果此时为王虔威的父辈入唐，先是被编列于营州城傍，在营州一带生活，作为孩童的王氏一同到达唐朝，此时王虔威为10岁上下（姑且界定为10岁），那么，其出生年代为659年，此后长大成人，随父辈为唐朝开疆拓土，积累了丰富的战阵经验。到694年，已是35岁的王虔威加入朔方军。在武周时代乃至随后的中宗、睿宗在位期间，他在朔方军建功立业。按照一般的年龄推算，694年王思礼应在10余岁，到761年其至少也是70岁的老翁了。显然，这与现有文献史料记载不甚符合。当然，如果王虔威入唐尚在襁褓之中，即668年王虔威在3岁以内，到694年，其也就是20余岁，此时王思礼出生，到761年王思礼至少已是60岁，似与现有史料记载基本相符，故可以认定。其二，作为高句丽中层将领，王虔威20余岁入唐。入唐后王虔威先是被编列于营州城傍，后转战唐朝其他边地，694年成为朔方军的一员。如此计算的话，王思礼的年龄仍然不是现有史料可以认定的年龄。

当然，也有韩国学者认为龙门石窟“北市丝行像龕王思礼铭文龕”和药方洞“王思礼铭文龕”两处出现的王思礼，就是上述《旧唐书》《新唐书》中所载高句丽移民后裔王思礼。^②只是从各种史料链及时空态势看，这种比对明显存在问题。已有韩国学者撰文质疑和商榷。^③

综上所述，应该是王虔威随父辈于唐高宗总章年间在高句丽灭亡之后入唐，其先是在营州城傍生活，成年后与入唐高句丽移民高慈等人一样^④成为唐军蕃将中的一员，并在随后的岁月里婚配成家，王思礼因此诞生。如上述解释没有问题的话，王思礼应是入唐高句丽移民的第三代，其出生年代约为7世纪90年代。至于作为高句丽移民的王虔威一族为什么姓王，是赐姓，还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由于没有史料证实，难以考论。只是作为所谓的“皇王”，出身高句丽王室的高句丽移民王毛仲也姓王。是否王思礼家族也是出自高句丽王室，或者高句丽王室远支，因不得而知，在此存疑。

2. 王思礼的军旅生涯

上述《旧唐书》《新唐书》记载王思礼首次加入王忠嗣率领的河西军。有关王思礼的军旅生涯，姜清波、郑炳俊等学者在其著作中均有详细论述，特别是姜清波收集现存《旧唐书》《新唐书》以及其他史料，对王思礼事迹有较为明确的诠释，并对现存《旧唐书》《新唐书》传记有所补缺。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① 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② 梁银景：《古代韩国人在中国境内所建造的寺院、佛像及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三国至统一新罗时期为中心》，《讲座美术史》第29辑，2007年。

^③ 朴现圭：《洛阳龙门石窟中与古代韩国相关佛龕考证的几个问题》，载《中韩金石文献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357-359页。

^④ 拜根兴：《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其一，王思礼在安史之乱前的表现。王思礼与哥舒翰两人均在河西军王忠嗣手下做押牙，后哥舒翰官拜陇右节度使，王思礼并未升官，转任哥舒翰行营押牙，也就是说，王思礼的官职未见丝毫变动，只是在不同的将帅麾下做具体的勤务警卫工作。特别是与其同做押牙的哥舒翰官拜节度使，王思礼依然做新任节度使哥舒翰的押牙。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哥舒翰对王思礼的态度，这就是既信任又不予重用。王思礼并不热衷于升迁，而是干一行爱一行，并因此给自己积攒人脉。天宝八载（749），哥舒翰率军对吐蕃占领的石堡城发起总攻，作为押牙的王思礼身先士卒，作战勇猛，在攻取石堡城战役中建立奇功，进而官拜右金吾卫将军，充关西兵马使兼河源军使。天宝十一载（752），王思礼被授予云麾将军。可以看出，此时已过不惑之年的王思礼才迎来一生的高光时刻。天宝十二载（753），哥舒翰率兵征伐九曲，王思礼与参战诸军配合失当，未能按照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哥舒翰对此大动肝火，下令斩杀王思礼，后因其他原因释放了他。王思礼对此不甚理解，说：“斩则遂斩，复招何为？”^①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哥舒翰对王思礼的才干还是比较看重的，九曲战役获得大胜，他不愿失去王思礼。同时，王思礼其人敦厚直白，认为错就是错了，承担过错并无不妥。正因如此，哥舒翰手下的将领们对王思礼钦佩有加。天宝十三载（754）末，吐蕃苏毗部王子悉诺逻投诚唐朝，唐朝诏令哥舒翰前往磨环川迎接，哥舒翰本想带王思礼一同出行。在此重要关口，王思礼坠马伤足，哥舒翰只好告知前来的太监李大宜，王思礼因故难以赴命。由此可见，王思礼其人在朝野已广为人知，或许唐玄宗亦有成命，不然哥舒翰不可能专程告诉皇帝的信使，说自己的某个手下如何如何。王思礼最终没能参与这次行动。天宝十四载（755），王思礼加官金城太守。

其二，安史之乱期间的活动及功勋。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任命哥舒翰为天下兵马副元帅，王思礼获得哥舒翰的推荐，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太常卿同正员，充元帅府马军都将。每有大事发生，哥舒翰均单独与王思礼商议对策。因为安思顺为安禄山的族兄，王思礼向哥舒翰提出建议，史载：“十五载二月，思礼白翰谋杀安思顺父元贞，于纸隔上密语翰，请抗表诛杨国忠，翰不应。复请以三十骑劫之，横驮来潼关杀之，翰曰：‘此乃翰反，何预禄山事。’”^②可见，在安禄山叛乱的大前提下，王思礼想以自己的方式为平叛大业做贡献，但哥舒翰对此多有顾虑，特别是针对诛杀杨国忠的建议，哥舒翰可能内心赞同，只是不能明确表态。^③从最终的结局看，且不说安禄山叛乱打的旗号就是“清君侧”诛杀杨国忠，杨国忠及其党羽的倒行逆施产生的后遗症在朝野引起的反弹亦非同小可，而在“马嵬坡事变”中杨国忠及其家族成员死于非命就能说明问题。可见，并非哥舒翰不想诛杀杨国忠，而是他所处地位及此前的老对手安禄山如此做，他步其后尘显然并不恰当，更何况在当时平叛的大背景下，其如此做显然有悖常理，因此他对王思礼的提议只能持否定态度。天宝十五载（756）六月，潼关失守，王思礼和其他将领溃败西逃，投奔已自立为帝的太子李亨（唐肃宗）行在。不过，他们到达安化郡（今甘肃庆阳）后，“思礼与吕崇贲、李承光并引于纛下，责以不能坚守，并从军令。或救之可收后效，遂斩承光而释思礼、崇贲，与房琯为副使。便桥之战又不利，除为关内节度使。寻遣守武功”^④。可以看出，新立的唐肃宗对于潼关失守归来的将士，为检验其忠诚与否，还是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王思礼经受住了考验，并被唐肃宗予以重任，担任关内节度使。对此，有学者认为，王思礼是太子系的人物。潼关战败后，唐肃宗李亨对溃逃来奔的诸将“责不坚守”，却“独斩李承光，赦思礼等”。日后王思礼追随肃宗、屡蒙重用，上元元年（760）加司空，恐怕他在潼关时已是倾心于太子的军将。值得深思的是，前述安思顺事件，王思礼就是主要策划人。再从他与步军都将李承光二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6，“唐玄宗天宝十二载”条，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919页。

② 《旧唐书》卷110《王思礼传》。

③ 有学者依据《新唐书》卷104《哥舒翰传》及《资治通鉴》卷218“肃宗至德元年五月”条记载，认为王思礼请求诛杀杨国忠，不意走漏风声，杨国忠因而奏请唐玄宗在禁苑训练监牧小儿三千人，加强防范。参见牛致功：《安禄山与史思明评传》，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113页。

④ 《旧唐书》卷110《王思礼传》。

人争长不叶、互不服气，行军司马田良丘对军政“不敢专决”的情况看，王思礼、李承光二人恐各有所属，正如王思礼倾心于太子一样，说不定李承光就是倾心于宰相杨国忠者。李承光在高仙芝被斩后摄统军务，说明他并不是随哥舒翰一同赴关的。这大概也是潼关战败后李亨单单杀他的根由。当然，这都是依据一些现象所做的推证，可看作一家之言。^① 不过，潼关军将的政治立场与政治倾向确实值得玩味。

其三，在郭子仪、李光弼手下任职。有关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王思礼的军事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首先，应对安史叛将安守忠、李归仁、安泰清进攻，退守扶风防御，郭子仪率军救援，最终渡过危机。其次，至德二年（757）九月，先从广平王李俶收复西京长安，随后又率兵听从郭子仪差遣，经过陕城、曲沃、新店战斗，收复东京洛阳。特别是在绛郡，王思礼率兵“破贼六千余众，器械山积，牛马万计。迁户部尚书、霍国公，食实封三百户”^②。只是好景不长，乾元二年（759）三月，郭子仪及其他九位节度使包围安庆绪叛军于相州，但最终以唐军溃败收场。^③ 也就在这次战役中，只有王思礼、李光弼的军队没有遭受损失。此后，王思礼接受李光弼号令，朝廷“制以思礼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御史大夫，贮军粮百万，器械精锐。寻加守司空。自武德已来，三公不居宰辅，唯思礼而已”^④。这里提到的三公是指“太尉、司空、司徒”，王思礼官拜三公中的司空，但仍兼御史大夫，开唐代官职制度之先例。上元二年（761），王思礼“以疾薨，辍朝一日，赠太尉，谥曰武烈，命鸿胪卿监护丧事。思礼长于支计，短于用兵，然立法严整，士卒不敢犯，时议称之”^⑤。从史料记载看，朝野对王思礼的病亡还是十分重视的。且不说唐肃宗“辍朝一日”，查阅相关史料，在唐朝功臣中，死后谥号中有“武”字者只有马璘、李愬以及王思礼3人；死后谥号中有“烈”字者有11人，即李孝恭、程务挺、契苾何力、田归道、韦光乘、张孚、孙志直、韦谦光、张献甫、司马逸客、李安期；谥号中有双字“武烈”者，现在看到的只有王思礼一人而已。^⑥ 也就在这一时期，著名诗人杜甫曾以《赠司空王公思礼》为题，撰写长诗以示哀悼。不过，上述《旧唐书·王思礼传》记载赠王思礼“太尉”，而杜甫诗却题为“司空”。具体来说，杜甫诗作时间明显早于《旧唐书》的记载，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更何况王思礼确实曾官拜“司空”，故两者各有所据，并不矛盾。不妨将此诗抄录如下：

司空出东夷，童稚刷劲翮。追随燕蓟儿，颖锐物不隔。
服事哥舒翰，意无流沙磧。未甚拔行间，犬戎大充斥。
短小精悍姿，屹然强寇敌。贯穿百万众，出入由咫尺。
马鞍悬将首，甲外控鸣镝。洗剑青海水，刻铭天山石。
九曲非外蕃，其王转深壁。飞兔不近驾，鸷鸟资远击。
晓达兵家流，饱闻春秋癖。胸襟日沈静，肃肃自有适。
潼关初溃散，万乘犹辟易。偏裨无所施，元帅见手格。
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胡马缠伊洛，中原气甚逆。
肃宗登宝位，塞望势敦迫。公时徒步至，请罪将厚责。
际会清河公，间道传玉册。天王拜跪毕，谏议果冰释。

① 参任士英：《潼关战局与天宝中枢政局之关系发覆》，《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② 《旧唐书》卷110《王思礼传》。

③ 有关这次战役，唐肃宗并未设立前线总指挥，只是确定由宦官鱼朝恩担当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结果使战场上诸军配合混乱，加之极端天气等原因，唐军溃败。参见牛致功：《安禄山与史思明评传》，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

④ 《旧唐书》卷110《王思礼传》。

⑤ 《旧唐书》卷110《王思礼传》。

⑥ 王溥：《唐会要》卷79《谥法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21-1734页；王溥：《唐会要》卷80《谥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35-1763页。

翠华卷飞雪，熊虎亘阡陌。屯兵凤皇山，帐殿泾渭辟。
金城贼咽喉，诏镇雄所搃。禁暴清无双，爽气春淅沥。
巷有从公歌，野多青青麦。及夫哭庙后，复领太原役。
恐惧禄位高，怅望王土窄。不得见清时，呜呼就窆窆。
永系五湖舟，悲甚田横客。千秋汾晋间，事与云水白。
昔观文苑传，岂述廉蔺绩。嗟嗟邓大夫，士卒终倒戟。^①

这首诗明确指出王思礼祖先来自东夷高句丽，即王思礼本人为高句丽移民后裔。王思礼少年时就勇猛多力，追随燕蓟豪杰人物横空出世，最终成为唐朝的一员蕃将，为唐朝的安危繁荣建功立业。与在唐的其他民族将领一样，作为蕃将的高句丽移民后裔王思礼，在西域广阔地域捍卫唐朝的权威，战斗在平定安史叛乱的第一线，进而走完他辉煌而传奇的一生。正因如此，他成为“诗史”杜甫笔下极力宣扬表彰的人物之一，不仅显示出王思礼作为国家栋梁，在动乱年代为唐朝所建功勋，而且展现了他赢得民间或者说游离于民间的诗人的崇敬和爱戴。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唐朝内，作为唐人的一员，其与另一高句丽移民后裔高仙芝一样，都为唐朝的繁荣强盛作出重大贡献，只是由于安史之乱爆发，高仙芝未能善终，冤死于潼关；^②而王思礼在萧杀的战争氛围和复杂的朝野政情下，成为这一时期在唐高句丽移民后裔中官职最高、贡献良多并能善始善终的人物。

二、高句丽移民后裔李正己事迹

1. 史书对高句丽移民后裔李正己的记载

有关李正己，《旧唐书》《新唐书》有传，《资治通鉴》亦有详细记载。不过，有关李正己先祖的记载相当简单，韩国学者郑炳俊^③、中国学者姜清波均有研究提及。笔者认为，作为高句丽移民后裔的李正己，虽然在安史乱后的动乱年月里针对唐朝不时暴露出反叛与分离，但他充其量就是一位跋扈贪婪、同唐朝或对立或屈从的地方藩镇而已，过多强调他的高句丽出身，似并不符合8世纪中后期唐朝社会的客观史实。另外，李正己出生于平卢，其家族最终活动区域在河北北部及山东半岛，他本人曾到过唐都长安，虽然有的学者界定其为所谓“徙民”^④，但他仍是高句丽移民后裔的一部分。据《旧唐书·李正己传》载：“李正己，高丽人也。本名怀玉，生于平卢。”就是说，李正己的族属出自高句丽，出生于平卢。平卢即平卢府，属于唐河北道平州（北平郡），平卢为郡治所。姜清波推定李正己应出自营州平卢节度使辖下，理由是李正己可能出自营州所在的“城傍”组织，他还依据现有史料推证出其他几种可能。^⑤宋卿则详细考证了卢龙节度使设置相关史料记载的异同，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⑥由于史书记载简单，上述推定似都有可能，对此还需查阅史料做进一步考察。到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李正己斩杀平卢节度使王玄志之子，与其他军将共推姑表兄弟侯希逸为节度使，

①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22，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349-2350页。杜甫《八哀诗》序云：“伤时盗贼未息，兴起王公、李公，叹旧怀贤，终于张相国。八公前后存歿，遂不诎次焉。”杜甫鉴于安史乱离还未结束，而朝廷却有八位栋梁因各种原因亡故不存，故而作诗以之纪念。有关《八哀诗》，探讨杜诗的中外研究者多有阐发，而专对《赠司空王思礼》的研究，参见张寒：《〈八哀诗〉之王思礼考辨》，《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15期。

② 参见池培善：《高句丽人高仙芝（2）：以对阿拉伯战争为中心》，《东方学志》第112辑，2001年；苗威：《高句丽移民后裔高仙芝史事考》，《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1期。

③ 韩国学者郑炳俊有五篇论文论及作为藩镇的李正己其人事迹，参见郑炳俊：《安史之乱与李正己》，《东国史学》第37辑，2002年；《李正己一家藩镇和高沐》，《历史学报》第180辑，2003年；《李正己一家的交易活动和张保皋》，《东国史学》第40辑，2004年；《唐朝的高句丽人军事集团》，《东北亚历史论丛》第24号，2009年；《德宗的藩镇改革政策和平卢节度使李正己》，《中国史研究》第81辑，2012年。

④ 参见蒙曼：《唐朝军事系统中的朝鲜半岛徙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⑤ 姜清波：《入唐三韩人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2-113页。

⑥ 宋卿：《唐代营州与东北边疆经略》，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02-128页。

进而成为平卢节度使麾下的主要将领之一。不难看出，侯希逸的母亲是高句丽移民后裔，证明高句丽移民第二代之后与唐人联姻已很普遍，在营州一带的高句丽人也不例外。如此反推的话，平卢节度使下辖军兵中的高句丽移民后裔应不会少。

关于李正己的姓名字号问题。按照一般的研究，这一时期除高句丽王室和高级贵族之外，一般人并没有姓氏，出生于平卢的李正己也不例外。据上述《旧唐书》“李正己传”记载，李正己原名“怀玉”，当然，“怀玉”两字有可能是用汉字代写的高句丽语李正己的名字，“怀玉”似没有体现姓氏或者现存史书并未记载姓氏。直到“怀玉”官拜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青州刺史之后，唐朝为其赐“正己”名号，“怀玉”名号因此成为历史。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正月，官拜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淄青节度使，已赐名为“正己”者请“附入属籍，敕旨从之”^①，即李正己附入李唐宗室籍贯，获得赐姓“李”，李正己的姓名全称得以出现。至于李正己赐姓之前如何称呼，即单名称还是什么，因没有史料提及，在此存疑。需要说明的是，在入唐高句丽移民及其后裔中，现在知道李姓者还有李他仁、李仁德（李宜德）两人，他们为何姓“李”，却未见史书记载。

另据《资治通鉴》卷二二七载：建中二年（781）“时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已薨，子纳秘之，擅领军务”^②。《旧唐书·李正己传》又载：“建中后，畏惧朝廷，多不自安。闻将筑汴州，乃移兵屯济阴，昼夜教习为备。河南骚然，天下为忧，羽檄驰走，征兵以益备。又于徐州增兵，以扼江淮，于是运输为之改道。未几，发疽卒，时年四十九。子纳擅总兵政，秘之数月，乃发丧。”由此可知，李正己于建中二年去世，时年49岁。唐德宗建中二年为781年，依据古人以虚岁记载年龄的惯例，如此李正己的出生时间应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

由此可知，李正己出身于一般高句丽人家庭，由于身在营州一带并且处于爆发安史之乱的大背景之下，于动乱岁月中成长的高句丽移民后裔李正己正式登场，为此后给唐朝造成颇多麻烦的藩镇提供了新的样本，这就是高句丽移民后裔也成为雄踞一方的藩镇。李正己不仅担当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还负责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在唐及其藩属新罗渤海的交往中担当重任，成为中唐时代唐朝不得不采取行动拔掉的藩镇硬骨头之一。

2. 李正己及淄青节度使与新罗的关系

据《资治通鉴》卷二二七、《旧唐书·李正己传》，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李正己于建中二年去世，享年49岁。李正己死后，其长子李纳秘不发丧，企图发动针对唐朝的叛乱，对此，《旧唐书·李纳传》有详细记载：

建中初，正己、田悦、梁崇义、张惟岳皆反。二年，正己卒，纳秘丧，统父众，仍复为乱。比会悦于濮阳，遣大将卫俊将兵一千救悦，为河东节度使马燧败于洹水，杀伤殆尽。诏诸军诛之，纳从叔父洧以徐州，李士真以德州，及棣州李长卿，皆以州归顺。纳以彭城险厄，又怒洧背宗，乃悉兵围之。诏宣武军节度刘洽与诸军救之，大败纳兵于城下。后将兵于濮阳，洽攻破其城外。纳自城上见洽，涕泣悔罪，遣判官房说以其弟经、男成务朝京师，请因洽从顺。

这里提到与高句丽移民后裔关联的诸人应引起注意。首先，李纳的从叔父李洧，应该是李纳父亲李正己的堂弟。就是说，李洧的父亲和李正己的父亲是亲兄弟，史书并未留下李正己父亲及其兄弟的名讳。也就是说，李正己的父亲兄弟们均应是高句丽移民。其次，李洧在其从侄李纳发动针对唐朝叛乱之时，联合其他李正己的部下归顺唐朝，进而引起李纳愤怒，竟然率兵围困李洧所在的徐州，最终在唐宣武节度使刘洽的援救之下，打败李纳所率叛军，并迫使李纳悔罪投诚。对于此事，著名诗人白

^① 王溥：《唐会要》卷65《宗正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50页；王钦明：《唐代属籍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条，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306页。

居易为其父亲白季庚撰写的墓志中有所提及：

公讳季庚，字某，巩县府君之长子。天宝末明经出身，解褐授萧山县尉，历左武卫兵曹参军、宋州司户参军。建中元年授彭城县令。时徐州为东平所管。属本道节度使反。反之状，先以胜兵屯埇口，绝汴河运路，然后谋东闚江淮。朝廷忧虞，计未有出。公与本州刺史李洧潜谋以徐州及埇口城归国，反拒东平。东平遣骁将信都崇敬、石隐金等，率劲卒二万攻徐州。徐州无兵，公收合吏民得千余人，与李洧坚守城池，亲当矢石，昼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而诸道救兵方至。既而贼徒溃，运路通，首挫逆谋，不敢东顾。由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三城到于今讫不隶东平者，实李洧与公之力也。^①

由此可见，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与将军李洧共同努力，确保了徐州城的安全防御。《旧唐书·白居易传》对此亦有记载。有关李洧事迹，《旧唐书》《新唐书》均附有《李洧传》，李洧又有弟名李淡。如按照时间推算的话，李正己、李洧、李淡应是高句丽移民后裔第三代或第四代，而李正己父亲，李洧、李淡父亲，侯希逸母亲，他们应是高句丽移民后裔第二代或第三代。至于李洧其人，《资治通鉴》卷二二七亦记载相关事迹，韩国学者池培善撰有专篇论文^②可予参考。

李正己及其子孙统治山东半岛大部地域六十余年，这一时期在登州沿海及其周边地域生活着大量的新罗侨民，韩国学术界致力研究的“海上王”或“海洋大使”张保皋势力相当活跃，在此从事贸易等活动，而对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家族的研究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如何评价淄青李正己藩镇与生活在这一地域新罗人的关系，中韩学术界研究的主旨各不相同，国内学者的看法也存在差异。

对于张保皋势力在唐朝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家族统治区内快速发展的动因如何，李正己家族对于贩卖新罗奴婢持怎样态度，学者提出了各自的看法。陈尚胜认为：“从李正己及其子孙听任自己所割据的地区经营掠卖新罗人口的活动来看，他们作为高丽人而对于新罗人仍然具有明显的歧视和敌意。事实上，在对待掠卖新罗人口的态度方面，李正己与在唐朝为低级军官的新罗人张保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③从高句丽最终被唐朝与新罗联合灭亡的史实来看，这种观点似有一定的合理性。李劲军与陈尚胜持有相似的观点。^④对此，赵红梅提出不同意见，并做了相应的论证。^⑤应该说，正因陈尚胜提出上述观点，启发研究者深入思考，才促使赵红梅提出反论，前者的开山之功值得肯定。韩国学者郑炳俊认为：李正己为扩大所辖区域的经济实力，利用自身的权力，控制垄断与新罗、渤海的各种贸易往来，在某种程度上为新罗人移居山东半岛登州一带以及张保皋势力编织纵横东亚贸易网络提供了可能。^⑥笔者虽赞同赵红梅的结论、理解郑炳俊的观点，但认为其论证有完备的必要。

笔者以为，从高句丽平壤城陷落的668年到安史之乱之后李正己割据势力的形成发展乃至灭亡，其间经过了百余年。在漫长的时间洪流中，作为高句丽移民后裔的李正己，已是在唐出生的第三代或第四代移民子孙了。在唐朝高度开放包容和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李正己其人头脑中的高句丽意识，以及所谓从先辈那里继承了对新罗人的偏见和敌视到底有多少，很值得怀疑。因为从现存高句丽移民墓志铭看，第二代高句丽移民和唐人通婚者已经很多，他们的籍贯已不再和原高句丽居地发生关系。唐朝对高句丽移民采取分散安置措施，除辽东所在的高句丽土著居民外，8世纪之后集团性的高句丽

①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4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836-2837页。

② 池培善：《对高句丽遗民李洧行迹的探讨》，《东方学志》第168辑，2014年。

③ 陈尚胜：《论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东岳论丛》2001年第6期。

④ 李劲军：《浅论唐代登州地区新罗村的成因》，载陈尚胜主编：《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7-98页。

⑤ 赵红梅：《在唐新罗人的聚居区及其相关问题探微》，载陈尚胜主编：《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9-90页。赵红梅认为：“若李正己排斥新罗人，那么就不可能在李氏家族势力范围内有如此大批的新罗人居住，特别是在登州还设立新罗馆，专门用于接待新罗官方使节。”类似论述还有一些，在此不赘。

⑥ 郑炳俊：《李正己一家的交易活动和张保皋》，《东国史学》第40辑，2004年；《押新罗渤海两蕃使和张保皋的对唐交易》，《中国古中世史研究》第21辑，2009年。

移民已不复存在,入唐高句丽移民很快融汇于唐人的汪洋大海,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并阻碍所谓的高句丽意识传递蔓延,入唐高句丽移民的子孙在唐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成为唐人一分子,当是必然的事情。^①与此同时,高句丽人原居地已被随后的靺鞨人占据,作为第一代或第二代入唐高句丽移民,故乡或许只是一种遥远的记忆,他们面对的现实是如何适应新的生活,并在唐朝多民族共处的大环境下生存下来。对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家族而言,维护并巩固已取得的利益,攫取更大的权利与好处,应该是其首先考虑的问题。再者,中唐以后,此前因各种渠道入唐的众多边方民族均融入唐人共同体之中,作为高句丽移民后裔的李正己家族亦不例外,只是诸如突厥、粟特、新罗、百济等入唐移民或侨民后裔中的一员。有鉴于此,主张李正己家族因歧视新罗人进而鼓励或者强力促成贩卖新罗人为奴婢的说法,稍显勉强。退一步说,即使李正己家族确曾为掠卖新罗人奴婢提供方便,将其解释为强化淄青镇长期割据,并为应对唐朝可能的平叛行动储备应对的人力物力,则更为合适。增加人口、税收、兵员,才是李正己藩镇割据势力考虑的头等事项。

与此相关,也有学者从时间选择与地理位置两方面探讨唐代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设置的原因,认为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担负一定的外交交涉及有关属国事务的管理,给由平卢淄青入唐境朝贡使者发放过所文书,负责唐与诸藩属国的海陆路运输贸易等职责,在登州设立押新罗渤海使衙或者新罗馆、渤海馆。^②已故黎虎、马一虹等学者对此有过阐发。^③笔者对此并未有新的见解,故不再作更多的阐释。不过,现有研究中遗漏的某些细节问题亦应得到关注。笔者爬梳新出土唐人墓志,发现两方墓志中提及墓主或墓主先祖曾官拜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死于大和年间王逖的曾祖王惟忠曾担当“河南河北租庸使兼新罗渤海诸蕃等使”^④,这在文献史料中未见提及。康志睦其人《新唐书》卷一四八有传,附于其父“康日知传”后,而康志睦墓志则详细记载宝历元年(825),康志睦被授予“平卢军事节度、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处置、押新罗渤海两蕃使”^⑤。当然,与李正己及其后代担当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一样,学术界统计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时应予以补充。

结 语

本文对海内外学术界已有爬梳研究的高句丽移民后裔王思礼、李正己两人事迹做了新的探索。依据现有史料推证王思礼先祖入唐的时间、其在安史之乱过程中为唐朝平叛所作贡献,对李正己家族势力涉及问题、李正己姓字的由来、淄青藩镇李正己与新罗的关系等问题提出己见。作为高句丽移民后裔,与最初入唐的高句丽第一代移民所处环境不同,王思礼、李正己在安史之乱前后复杂的朝野背景下走出各具特色的人生道路:王思礼兢兢业业为大唐平叛事业出生入死;李正己则成为统治山东半岛的地方藩镇。无论如何,与入唐的其他移民一样,他们两人及其家族最终融入庞大的唐人共同体,成为唐人的一员,显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唐朝奉行的包容开放策略卓有成效,这也是中华民族文明持续发展繁荣的绝好证明。

责任编辑:于 凌

① 拜根兴:《入唐高句丽移民研究的现状及其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8期。

② 姜清波:《试论唐代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③ 黎虎:《唐代的押新罗渤海使》,《庆州史学》第20辑,2002年;马一虹:《渤海与唐朝押蕃使关系述考》,载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④ 《唐故苏州司户参军王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⑤ 《唐检校左仆射赠司空会稽康公(志睦)墓志》,载何如月、王勇超:《石墨镌华: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馆收藏碑志集释》,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23页。